

文庫博物館專集（二十六）

【推荐者按：伟大领袖毛主席挥巨手号召上山下乡是1968年底大约12月份的事。而其实在此之前一年，也就是1967年秋季，已经有一小批人自愿下乡到内蒙古锡林格勒盟，东乌珠穆沁旗（简称东乌旗）去了。算来到1997年，正好是三十周年。事后看来，上山下乡运动对老三届来说，犹如一场飞来横祸，最后也以

散伙告终。但当初亦非完全没有野趣。这里选载的是最初这一小批知青中的人写的插队诗。尽管现在看来，有些语句显得过时，但都是当时真情的记录，故不加修改，照录于此。作者邢奇是北京东城区一所中学的老高一学生。】

题记

内蒙放牧，匆匆青春度。
插队生活谁记录，杂七杂八，此有诗一束。

当年知青今何处，雨散星离，各走各的路。
往事早已进坟墓，诗集作碑，聊向坟前树。

这首题记是1976年整理插队旧作时写的，现在把它放在本集之首，聊以代序。

本书收录的诗作大部分是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草原时写的，我从1967年1月至1976年3月在锡盟东乌旗满都宝力格牧场（曾改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插队，除了短时期的伐木、打草、打石头之外纯是放牧，开始时放了一小段牛，后来一直在放羊。我愿这本书能反映出我们当年的插队生活。

.....

1997年是我们去内蒙牧区插队三十周年，谨以此书致献。

——邢奇

※※※※※※※※※※※※※※※※

一、初到草原

初到草原

白雪蓝天黄草，马嘶风吼狗叫。
歌唱可开喉，雪里扬鞭一笑。
一笑，一笑，别有一番风貌。

离京路上

天高眼阔，纷纷事，都来眼底。
十几年，课本压顶，凭楼面壁。
风雷一起燕山崩，石雨四溅兵马洗。
干革命跟着红太阳，毛主席。

今去也，东乌旗，纵马蹄，怀广宇。
笑庸人天下，斗室足矣。
未到草原先一笑，早知地非平如砥。
弄潮儿志在风雨中，大海里。

登山

莫道登山满眼荒，君请看，马牛羊。
炊烟几点，自是有风光。
一年四季风来去，为大地，换时装。

大自然里敞胸膛，千万里，一眼装。
回想城市，翻笑小院方。
人生何必守家乡，青山外，天地长。

※※※※※※※※※※※※※※

二、马倌与马

傍晚

傍晚如闻轻雷起，坡上尘头，马群饮水去。
五百匹马，结阵疾走，蹄声加响鼻。
草山余晖，衬在五色马群后。
人喊马嘶，溶入晚霞落照里。

套马爱乘晚来风

套马爱乘晚来风，几竿下，半群崩。
一马出群，显然又追惊。
乱嚷声中看紧盯，暮色中，两奔星。

七盘八转距离小，甩出套，身前倾。
鞍子一转，眨眼人腾空。
拖在地上手不松，草原人，有英风。

群中玩马

群中玩马比高低，甩套伸竿不算奇。
忽然鞍上蹿将起，换乘身旁另一匹。

不胎巴

甩套稍微不到家，索绳猛向前胛滑。
马倌俯拽鞍轭后，四外齐呼不胎巴。

——注：胎巴。蒙语：撒手不管。

马倌套马倒栽葱

马倌套马倒栽葱，脑袋着蹄出响声。
观者倒吸凉气看，起来无事很轻松。

打鬃圈外

打鬃圈外爆欢声，套手竿迷各显功。
野性与人相角力，前匹勾倒后仍冲。

雪暴

初春才暖又寒风， 雪暴袭来回到冬。
风赶马群陷巨淖， 百余匹马竟捐生。

这马倌，真他娘

晴天也冷夜真长，山已白，草更黄。
不怕马瘦，何人四蹄狂。
倏忽来前君请看，骑骡马，貌惶惶。

昨日马群又“胎巴”，四匹死，五匹伤。
尚缺一半，不知在何方。
夜里睡觉白天忙，这马倌，真他娘。

裘上加裘球样圆

棉布加身不挡寒， 入冬须把毛皮穿。
马倌下夜随群去， 裘上加裘球样圆。

下马夜

天乍晚，雪风起，眼前都似黑锅底。
马放边陲非儿戏，晚餐未敢嚼仔细。
奔入山中已无迹，茫然不知何处觅。
竖两耳，飞四蹄，手电光中雪花急。
马上难分东和西，只从颠波知高低。
急中生汗透内衣，脱帽又怕寒气逼。
空山旷野皆沉寂，唯有风声入耳际。
忽然马蹄变奋起，连连长嘶向前去。
拍马大叫真不易，一块石头落了地。
检点马群才完毕，不觉风雪已平息。
远近山形渐依稀，一片微红在天际。
风里穿行雪里去，我有豪情迎四季。

马倌仪表都堂堂

马倌仪表都堂堂，马又快，竿又长。
四蹄起落，前腿必成双。
借问同去为哪桩，炊烟处，炸果香。

茶余话题仍照样，论套马，比谁棒。
各自吹嘘，彼此不相让。
争到急了把马上，去马群，比一趟。

串包

纱巾绕颈迎风飘， 剽悍男儿去串包。
脸比平常多挂土， 只缘擦上雪花膏。

马（一）

积雪浑平牧草疏， 马群踏雪声扑扑。
雪壳踏破如薄刃， 腕上长毛被剃秃。

马（二）

挥蝇马尾自潇闲， 撵草赶毡摆动难。
剪短功能聊可用， 可惜风度未还原。

马（三）

山顶全如冰雪国， 马寻好草总难得。
偶然碰到蓝花朵， 闭目小心咬刺壳。

马快俯身抱马脖

马快俯身抱马脖， 一颠跌入发昏国。
缘何自找栽跟斗， 初练完全照小说。

春风得意马蹄疾

春风得意马蹄疾， 沿着电线直向西。
新分马一匹， 真是好坐骑。

速度快之极， 狂喜忘其余。
电杆斜拉固定线，
哎哟！还好， 刚刚蹭头皮。

生驹

生驹咆哮扎头奔， 蛮力使出才几分。
驯马之人谁与似， 惊涛骇浪一舟人。

比马

绿草勾出比马心， 青春当下化流云。
后人眼看追不上， 鞭子抡圆犹猛拼。

跑马之歌

嘿！草原跑马最壮美 。
嘿！好马还用快鞭催 。
右手抽，左手勒，马蹄声声响轻雷。
前人快，后人追，人如乘风马如飞。
嘿！迅猛的马速，雄健的马队，
闪动的马蹄，飘飞的马尾。
嘿！把时间追赶，把胆小踢碎，
把目标看定，把坚持领会。
唉嗨嘿！
唉嗨嘿！

□ phlxl@gauss.bwh.harvard.edu 推荐

∞ ∞ ∞ ∞ ∞ ∞ ∞ ∞ ∞ ∞ ∞

静 静 的 团 泊 洼
——一个少年记忆中的干校
• 吴 梦 •

大概是一九六八年的秋天，当时的文化部系统属于砸烂单位，“一锅端”地去了“五·七”干校。而上高中的姐姐早已插队去了内蒙古，我便随父母一起，开始了干校生涯。

文化部的干校分成了两块：一块大的，在湖北咸宁，连家属有两万多人；另一块较小，千把人，经河北的官厅、宝坻，最后抵达了诗人郭小川描述过的团泊洼。我随父母去的就是这后一块。

◇ “诗”与“歌”

干校第一次“收获”，亩产九十斤（当地平均亩产四百斤），学员们大肆庆祝：包饺子，会餐。干校里诗人不少，有写古体诗的，不到十行下来，竟有半数以上的字我不认识，旁人解释半天也不甚了了；还有写马（雅科夫斯基）体诗的：一行里，要么没几个字；要么长的顶了纸边还拐一个小弯。一位《诗刊》的编辑大唱丰收赞歌，给人深刻印象；第二年，干校的麦田亩产勉强过百，该编辑更作诗唱“大丰收”，后来人们都称其为“丰收诗人”。

干校的学员都住在本地老乡家里，小孩子则在当地的农村小学借读。农村小学本是没有音乐课的。一日，大队书记突然心血来潮：干校是文化部的，何不向他们求援音乐老师？整个干校都是来受再教育的，贫下中农之求焉有不应之理？赶快给村里的小学派了一位音乐老师，是写历史歌曲《坐牢算什么》的音乐家舒模，当时也有六十多岁了。

那时已是无歌不黑，也没个课本，舒老先生只好教唱毛主席语录歌。印象最深的一首是“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那首歌的歌词只此两句，车轱辘话来回转。但舒老师教得十分投入，又是挥手打拍子，又是绷着脖子叫劲，以不同的曲调高低，节奏力度来回不断地诠释那两句词。结尾时，“谁能敌”本应是很干脆的，可当地口音总要在结尾的句子上加一个“呀”字。为了纠正这个“呀”字，舒老师不知带我们唱了多少遍的“谁能敌”。从此，孩子们就给舒模起了个外号“谁能敌呀”。

◇ 年轻人与大字报

干校中除了老弱病外，还有一群青年，大学刚刚毕业的。

最热闹的时候是逢年过节的演出联欢。音协的唱歌，舞协的跳舞，戏曲研究院自然就唱样板戏。当时样板团大红大紫的角儿们多是他们的学生或师兄弟妹，议论数落起那些当红的名角就跟说他们家的小三、小四似的。有一位老刘，是京剧老生的研究生，专演杨子荣，最擅长把剧中的戏词用于生活。杨子荣有一段：“八连长，带几个弟兄沿着上山的道儿……”，等食堂开饭时，他用同样的唱腔唱道：“八班长，带几个弟兄去把饭给我打来！”还有一帮戏托子，知道在哪里帮衬，严丝合缝，众人大笑。

都是二十多岁的人，相互斗争掐架是难免的，何况党中央老是想出一个又一个的事头儿来让你们掐？此时正是抓“五一六”的高潮，说白了就是镇压文革初期的造反派。一夜之间，食堂外的空场里就挂满了大字报。相互间都是指名道姓地打伐，还有夫妻间攻讦的大字报，语气词汇都是怒不可遏，义愤填膺的。

村里的小孩子数着大字报上的人名在谁家住，然后就带孩子们指指点点看新奇。而干校的孩子就傻了，昨天还一起说笑的叔叔阿姨们怎么一夜间就反目成仇了呢？后来才知那都是以前的过节，有机会就要发一发，泄一泄的。多是就人论事，或就事论人，而非就事论事。所以，炮弹般的重词用了不少，可什么也说不清楚，倒把一个年轻、胆小的女子给逼的想不开自杀了。另一个被贴大字报最多的男士，其夫人饰演《智取威虎山》中的勇奇妈（全剧主要台词是一句：“勇奇！——（昏过去）”），算是样板团主要演员，优先照顾两地分居，以此理由逃回了上海，免过一劫。

多年之后，干校散了。一些人相互间仍不说话。细究，都是历次运动落下的碴。倒是“逍遥派”们不错，没落下什么仇人，多成了各单位的业务骨干。我朦朦中认定，学点东西干点事儿比什么都强，争一时的口舌之快，到头来只是伤感情和瞎耽误工夫。

◇ 静静的团泊洼

团泊洼是五十年代“战洪图”、保天津时，炸开河堤冲出的一片盐碱大洼地。其后，在此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劳改农场，共有十几个分场。说其巨大，是因周围好几百里无人烟，且平平坦坦，无处可藏，说是为了便于抓逃犯。

劳改农场把最靠近大堤，当地称“碾”的一分场址分给了干校。可分场间的地还是相接的，由此造成了一种特别的景观：干校的地里，吵吵嚷嚷，大家开着玩笑，有时互相还逗逗闷子，拉一些歌；而相邻的地里，一群剃了光头的囚犯，穿着统一的黑色囚装，在那里默默地干活。不远处的地边，戳立着一位端着枪、神情木讷的军人，呆望着这一切……。

可一到了下午，人们显现出了疲惫，再也听不到了笑声和叫声，田地里传出一片死寂，见到的只是默默锄地的身影和扎眼的那位持枪战士，这时你才感到干校的人真是来被“改造”的。

文化部干校的人均是文人，气质上十分敏感，又聚满了当时著名的“牛鬼蛇神”。诗人郭小川到团泊洼是很后期的事情了。对其印象不深，只知道他虽然诗写得挺溜，可话说不清楚，是个结巴。不知当时他犯了什么事，总是被看管着，不与其他五七战士们同住，后来又不见了。听说是当朝的纪登奎曾为郭的部下，以体验生活之名把他给弄到了河南。“四人帮”垮时，他正在河南红旗渠，赶往北京的途中，夜晚抽烟失火，竟烧死在招待所中……

“团泊洼，团泊洼，
你真是这样静静的吗？！”

这是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一诗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两句。一是因诗朗诵者金乃川语气上的处理；另一原因就是听到此时总浮现出沿着独流简河碾道边大片大片的芦苇。在月高风清的夜晚，整个团泊洼确是一片寂静，小孩子夜里在房后墙浇了尿都是跑着回家，怕被鬼捉了去；然而，若赶上了三、四级以上的秋风，整个的干校就处在一片涛声之中，相互间说话都得对着喊了。当然，人们提高嗓门，有

时并非因别人听不见。

我所在的连队，有一位老“右派”，剧作家吴祖光。老人年轻时风流不羁，有神童之誉。二十岁即创作出了传诵一时的名剧《凤凰城》。四十年代周恩来在重庆统战了一大批文艺界名流，也有吴祖光。当时陕甘宁边区正在搞“反游手好闲的二流子”运动。文人们一看，这不说的正是我们吗？就聚在一起，自号“二流堂”，据说吴祖光即在其中。这段谐谑后来没少给这批文化人带来麻烦。当然，象吴祖光这样的“政治老运动员”，早入了“虱多不痒，债多不愁”的境界，已不在乎多这一星半点的小罪名了。

一日，我正在连部的办公室玩。突然听得一声大吼：“吴祖光！站过来！”眼见刚刚还慈眉善目逗我玩的一位浅麻脸阿姨，朝刚刚进门的吴祖光喊了起来。原来，他们要开始公事了。我当时被吓得竟忘了应该躲避，仍在办公室假装继续玩着手里的东西。整个过程基本上是浅麻脸阿姨开训，吴祖光听喝。具体内容我是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只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大人对大人也是可以象大人对小孩子一般训斥的。当时我的心目中，一下想起刚看过的电影《闪闪的红星》中游斗胡汉三的场面。

吴祖光倒是老道了，趁浅麻脸阿姨没注意的时，还朝我挤眼一笑，吓得我赶忙红着脸把头别了过去。

老文艺干部中，象吴祖光这样的还是很让人敬佩的，多少年来不卑不亢。我也确见过一些人，在台上时拔扈飞扬。落台下后，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往自己头上扣屎。

□ 原载《民主中国》37期（1996/9）

∞ ∞ ∞ ∞ ∞ ∞ ∞ ∞ ∞ ∞

小黑儿的故事

• 明 彰 •

“史无前例”开始的那年夏天，我十岁。

在大学教书的父亲正在北京以外的什么地方协助贫下中农整理“三史”（村史、厂史、家史），已经去了几个月，还要再有几个月才能回来。在机关工作的母亲大概是白天正常工作，晚上加班搞运动。每天早早爬起来就走，晚上九、十点钟才精疲力尽地推著自行车进门。贪玩嗜睡的我常常是几天同她说不上一句明白话。

想必妈妈实在是自顾不暇，不得已决定把我送到姥姥家去呆一段。

姥姥家住在唐山的旧市区。在七六年那场大地震之前，那一带曾经有过三条长长的胡同，分别叫做状元头条，状元二条和状元三条。姥姥家住在状元三条。姥姥是否一位注册的佛教徒，现已无从考证。因为早在文革以前的中国大陆，任何公开信教、礼佛的举动久已被政府列为违法。但她为人慈悲宽厚，奉“走路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为生活信条确实是我亲眼所见。姥姥尤其爱猫。

小黑儿是只猫。我到唐山不久，小黑儿出世了。它浑身油黑，没半根杂毛。脸庞圆润，虎头虎脑，两只猫眼炯炯有神，已是先声夺人。再加上年轻好逗，整日东蹦西跳，自娱娱人，所以颇得全家上下喜爱，更是姥姥的心头肉。小黑儿颇通人性，知道姥姥对它最好，跟姥姥也最亲。姥姥进进出出忙家务，它经常跟在脚后，形影不离。在阳光明媚的夏日，它喜欢卧在向阳的窗台上晒太阳，姥姥从窗下经过，

它便伸出尖爪内缩的毛茸茸前爪，调皮地拨弄姥姥的银发，每每引来姥姥带笑的嗔斥。

我从小就有个毛病，见字就念，见书就读。走在路上，总是满口别字地读商店的招牌，告示，招来大人们带笑的纠正。就连上公共厕所，也常常拎上一本厚厚的《东周列国志新编》，不蹲到腿脚发麻，想不起回家。谁想这个今天许多望子成龙的家长求之不得的优点，在那个时代里，竟然改变了小黑儿的命运。

我生性好奇兼好动，经常是整天东跑西瞧，不著家，姥姥常跟人说我几个月之内，把那一带她几十年都没串过的门全串了一遍。一天我到隔一条街的状元二条去探险，一路上好奇地东张西望，习惯性地读那些墙上、电线杆上贴著的字纸。在一根电线杆前，我站下来认真地读一张巴掌大的，印在粗糙的马粪纸上的油印传单。传单的内容大致如下：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红卫兵的红司令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状元三条的养花种草，养猫养狗的地主、资产阶级老爷、太太们：玩花弄草、养猫养狗是地主、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的“四旧”，属于势在破除之列。本X X中学X X兵团限令你们在三天之内将所养猫狗花草自行处理。否则格抄勿论、格打勿论、格杀勿论！

我想到了小黑儿，于是急匆匆跑回家向姥姥报告。现在事后诸葛亮，这篇口气颇大的“檄文”，很可能是出自哪个初中生的一时逞兴之作，根据传单所用的纸张等判断，那个声势浩大的“X X兵团”，其实际兵力大概也只不过三两个人。传单上没有注明日期，可能在那里已经贴了有些日子，限定的“三天”期限也早已过期。但在当时，“公、检、法”被砸烂，人民政府已经正式终止了对人民的财产、生活的保障义务。抄家、游斗等“新生事物”刚刚涌现，有迅速在全国蔓延之势。就在半月前，状元三条东口，解放前开过医院的韩家刚刚被一群红卫兵抄了家、封了门，同姥姥素有来往的韩奶奶则被遣送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正因成分不好、韩家被抄而心惊肉跳的姥姥对我带回的这个情报可是不敢忽视。小黑儿当然可爱，但是为了一只猫而使一家老小七口人无家可归，扫地出门也是太不上算了。何况，万一真因为养猫而抄家，猫的性命当然也是保不住的。姥姥当机立断，立即遣我跑步召来了她的“军机大臣”——纪兆云家的。纪兆云家的是位中年妇女，纪兆云是她丈夫的名字，她本人姓什名啥已无从查考。现在想想，女人出嫁后，不单改姓，连自己的名字也没有了，当然很不合理。后来大一些，偷读《红楼梦》时，看到荣府的家人中有叫周瑞家的，王善保家的等等，才明白这也是国粹之一，古已有之。或许因为唐山民风纯朴，又远离京畿，所以六十年代中期还古风尚存，也未可知。我这里只是直叙史实，还请今天《导报》读者中的众女权斗士们息怒。

纪兆云两口无儿无女，家住状元三条西口的横街上，紧靠公共水龙的一间小屋。那时的唐山旧市区，室内上下水设施是想都没想过的奢侈品。水桶、扁担，还有半人多高的水缸是家家必备的取水、储水设备。长长一条胡同中，有公共水龙的院子也是屈指可数，虽然姥姥家斜对面的九号院就有一只院内水龙，但外院的人是从不去用的，因为牵涉到公摊水费的问题。院子里没有水管的人家，如有青壮劳力，便一根扁担、两只铁桶地去挑水。除了扁担、水桶，一把长长的双齿铁叉也是家家必备的“硬体”，那是旋开公共水龙的工具。为防止冬天冻裂，公共水管往往包在一座砖砌的垛子中，而水龙的轮幅形开关则藏在一只木箱里面，木箱上端开一小孔，供插入铁叉之用。这木箱看似粗糙简陋，木板因风吹雨淋而发霉生苔，其实那孔的直径以及木箱上端到水龙开关的距离，都是经过精心计算的，其中凝聚著力学

、人体生理学等几种主要学科的研究结果。其主要设计目的是防止街头顽童和过路人私开水龙，浪费公众的水费。小孩子胳膊细，手臂能伸进孔去，即便指尖勉强触到开关，但因为力矩太短，还是无力拧动。大人胳膊有劲，但手又太粗，伸不进那孔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纪兆云傍水而居，便以看管水龙，推车送水为生，几条胡同吃公共水龙的居民每家按月出一两毛钱，算是他的工资。傍晚时分，老纪往往坐在自家小屋窗口抽著烟袋，看到本片的街坊去挑水，便出来为你开关水龙。一些住得远，没人挑水的人家，他便隔几天定时推几桶水去，帮你倒进水缸。

解放前当过律师的姥爷去世后，姥姥一个人拉扯我的几个姨和舅舅，曾是老纪水车的长期固定用户。姥姥一个人操持家务，做六七口人的三顿饭，还常年地照顾着几个学龄前的外孙外孙女。跑街采买的事，忙不过来，就经常托付老纪的妻子，也就是纪兆云家的代办。老纪夫妇为人忠厚可靠，姥姥也一向待人宽厚，时间长了，纪兆云家的便成了我家的常客，有什么事，立即去办，赶上吃饭，也毫无客套。那时大家都不富裕，姥姥有什么好东西，总记著给她留一份，有了什么难事，也总爱同她商量。套用那个年代的话说，这两位年龄相异、背景有别的女人结成了“一衣带水”、“唇齿相依”的“革命战斗友谊”。

纪兆云家的是位身材健硕的中年妇女，面麻声高，走路、办事风风火火。不知从啥时起，还戴上了一块红布袖章。此刻接旨，立即同我赶回家。姥姥同她简单介绍了情况，讨论了几种方案，决定事不宜迟，当天就由纪兆云家的把小黑儿抱走，暂时寄养她家，因为纪家是众所周知的无产阶级红五类，她家应是安全的。过几天，纪家乡下老家有人进城，再转移到农村去。什么时候，等这股风刮过去，再接小黑儿回来。做了决定之后，姥姥拿出五毛钱，差我到副食店去买酱猪肝。姥姥对自己生活节省，有好吃的，先尽著别人。她偶尔晚上抿两口酒，都是让我去挑最便宜的打，九分钱一两，白薯干酿的。五毛钱酱猪肝，我知道姥姥这是摆大宴为小黑儿送行了。猪肝买回来了，姥姥一口口嚼碎，再拌上虾米皮和白米饭，一声声地唤来了小黑儿。姥姥看著摇头晃脑地大嚼的小黑儿，慈爱的目光中闪烁过几点泪花。擦黑以后，纪兆云家如约而来，一只竹篮，一块旧头巾，拎走了小黑儿。临走时，姥姥还把剩下的猪肝，也托纪兆云家的带上，自己还送到大门口。暮色里，姥姥伫立遥送，银发在晚风中飘拂。由于报信有功，引起大人重视而兴奋了一天的我，心中这时突然掠过疑云：我到底是帮了姥姥的忙还是伤了她的心呢？

第二天，纪兆云家的带来令人难受的消息。平素活蹦乱跳的小黑儿，到了新地方，一反常态，无精打彩，只是蜷缩在炕角的木柜顶上，昏睡不起。饭、水摆到脸前，抬头闻闻，也就罢了。第三天下午，纪兆云家的慌慌张张地跑来，进门就问小黑儿回来没有。原来是小黑儿不见了。

小黑儿一直没有再露面。

它是不是曾经努力过，像电影里那些千里归家的狗一样，想找回那疼爱它的姥姥和温暖熟悉的家，终于因为年幼体弱而死于非命，没有人知道，或是它因为这突然的变故而永久地丧失了对人类的信任，重归虎豹本性，变成一只凶狠、彪悍的野猫，逍遥乡野山林，儿女成群，无疾而终，也已不得而知。

一位与世无争，于人无害的老太太，只因为听外孙口述了一张红卫兵传单，就亲手将自己心爱的宠物送人，现在听起来，不免觉得荒诞甚至可笑，那时的人怎么那么胆小呢？我当时小，也不大明白。后来我自己也做了大人，上学、工作，逐渐地懂了害怕。你可以出身好，可以当官、入党，小心别表错态、跟错线、时时“靠拢组织”，处处“联系群众”。但仍然无时不刻地感受到那种普遍的、持续的、无所不在的恐惧。这种恐惧心理的形成，应该说远早于文革甚至远早于四九年，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说它象噩梦一样缠绕著几十年来许许多多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

。下至我姥姥这样的家庭妇女，上至位居万人之上的周总理（见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无能幸免。而文革初期只不过是这种恐惧又一次痉挛式的升级罢了。没有人保证以后就不会再有文革初期式的恐惧大潮卷土重来。

□ 原载《新闻自由导报》第209期

~~~~~

【史海钩沉】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 自由工人运动的先驱——独立工会“全红总”

• 方 圆 •

〔续上期（zk9708a）〕

### 七、中共中央、国务院下令取缔“全红总”

元月二十四日下午，“全红总”总部委员们，面对如此恶劣的形势，召开了王振海被劫持后的第一次总部会议。会议首先讨论了如何应变。大家一致认为，劫持王振海后立即来砸“全红总”，是希望在“蛇无头不行”情况下一举铲除“全红总”。现在目的没有达到，中共决不会就此罢手。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主动撤掉组织，逃回家乡寻找安全，但难保中共不会秋后算账。二是硬顶下去，大家都要作好坐牢杀头的准备。但只有这样才能为临时合同工争到权益和尊严。就是失败了，也可以唤起广大工人的觉醒。

因此，大家决定作一次无记名投票，在这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投票结果，与会的五十六名总部委员中五十五名选择坚持下去，一名选择撤销总部。紧接着，大家提出应立即推选一人接替王振海主持大局。经过选举，五十二票（不含本人）推选我出任“五人小组”（此时只有四人）负责人；四十八票推选杨政增补为五人小组成员，仍兼任保卫部长，其余成员职务不动。会议作出以下决议：

①二月一日撤出全国总工会大楼。发表声明，说明“全红总”总部将迁往广州。②杨政、余云庆、廖日海、周泉四人在二月二日前飞到广州做好总部搬迁的准备工作。③总部搬迁至广州后，北京建立“全红总”驻京联络站，地址设在冶金部第二招待所。④通知“全红总”西南区指挥部负责人李伯特在云、贵、川三省物色一处条件具备的地点建立基地。⑤北京分团二月一日撤出劳动部，迁往石景山钢铁厂。⑥郝维奇立即和各全国性组织和外地驻京联络站联系，召开一次全国性组织座谈会，建立全国性组织革命造反统一战线。

二十九日我将拟好的声明送李晋喧家，请她打印和盖上公章。三十日下午，李晋喧将打印好的声明送到我处。我一看此声明，大吃一惊。因为这份声明与我拟的那份声明相差十万八千里。李晋喧拟的这份声明竟是宣布“全红总”在二月一日自动解散，各地分团自行改名，参加本地区本部门的革命大联合。临时合同工制度留待运动后期改革。

我问李晋喧这是怎么回事！她振振有辞地回答，因她分管和中央文革联络，所以她把二十四日总部会议的六项决议和二月一日撤出全国总工会的声明都送到中央文革。她说，中央文革指示，要把声明改成现在这个样子。这样，对上对下都有好处。我问她这样重要的事为什么不和大家商量？她说，难道大家还会反对中央文革么？没有中央文革的支持，能生存下去吗？我很气愤地问她，组织都撤了，还生存什么？她把脸一板，厉声问我：“你敢和中央文革对抗？”

我不愿多和她争论，立即叫秘书余洪珠通知所有没有外出的总部委员到我的办

公室开会，大家来后我把和李晋喧的争执向大家报告并征求大家的意见。当时所有的人一看李晋喧的那个声明都发火了。杨政要李晋喧把印好的这份声明全部交出来。李晋喧从她手提包拿出大约三百份往桌上一摔，说：“我怎么知道你们敢反对中央文革？我早就把声明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广播局的造反派组织）的同志们分头去散发了，剩下的全在这里。”

杨政把桌子上的声明哗的一声全推散在地上，把手往李晋喧面前一伸，说：对不起，请把总部的公章印信和文书档案交出来。李晋喧急了，问大家：“大家同意交给杨政吗？”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同意！”这一下李晋喧傻了眼了。杨政问她：“你带来没有？”她结结巴巴地回答：“我…没有带来。”杨政说：“走，到你家去拿。”她连忙说“不…不…不在我家……”杨政的火更大了，毛胜年和余云庆也气得顿足，杨政大声吼：“你要什么花招？你不交出来小心你的安全！”李晋喧一听大耍无赖：“你威胁我？我就是不交，你敢怎么样？”杨政也不理她，叫上毛胜年和余云庆就走。李晋喧连忙拦住他们，大叫：“杨政你要去哪？你可不许乱来！”说着和杨政拉扯起来。我上前去隔开他们，严厉地告诉李晋喧，公章印信和文书档案是必须交出来的，如果你李大姐不愿交给杨政，可以交给我也应该交给我，因为大家已推选我接替了王振海的工作。她看无计可施，才把手一摆，翻着白眼说：“告诉你们实话吧，公章和档案我早就交给中央文革了。不信你们自己去问。我宣布，从现在起我退出‘全红总’。再见！”说罢，逃之夭夭。从此，我再没有见到这位大姐一面。

六七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告》，勒令所有全国性组织一律撤销。针对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这一通告，“全红总”发出《二告全国人民书》，采取和这个通告对立的立场。我们又贴出大字报并印发了传单，质问中共：为什么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学联、全国青联、全国工商联这些“全国性组织”有权存在，我们的全国性组织却要勒令撤销？公理何在？宪法何在？

中共看“全红总”仍然不肯就范，在六七年二月十七日直接针对“全红总”发出《关于文革期间对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处理问题的通告》。全文如下：

(一)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的联合通告是非法的，应予以取消。各省市劳动局根据“三团体”的联合通告所决定的一切文件，一律作废。

(二)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很不合理的，错误的，中央正在研究，准备分别情况予以改革。在中央未作出新决定以前，仍按原来办法进行。

(三)各企业、各单位的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应和正式的职工、工作人员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有权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为对领导上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应当平反。因此而被解雇的，应当回到原生产单位，按原合同办事，克扣的工资应当补发。

(五)要把混入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中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不是指家庭出身）清除出去。假冒组织名义招摇撞骗者，必须坚决揭露。

(六)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没有必要成立单独的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以及各地的分团应当取消。参加这个组织的革命群众，可参加本企业、本单位、本地方的革命群众组织。

七日

中共的这个文件发出后，尚未离京的“全红总”外地委员和北京藉的总部委员约三十多人在冶金部第二招待所二楼开了“全红总”在京总部委员的最后一次会议。“五人小组”成员金展云、郝维奇和我一起主持了这最后一次会议。

会议开始，我们首先讨论了中共取消“全红总”的文件。这个文件中的第三条指出临时合同工“有权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出临时合同工和正式工一样“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和《三家联合通告》中的第一条和“江青三条”中的第一条接近。相同的是这三个文件都肯定和保障临时合同工参政的权利和平等的待遇。不同的是官方的两个文件都不提临时工合同工的经济利益。

文件中的第四条，和《三家联合通告》中的第三条相似，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不提“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而提“因为对领导上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可见文件的制定者根本不承认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存在。二是把《三家联合通告》中第二条中补发工资一点含进去了。因此，文件的第三、第四两条基本上是《三家联合通告》被阉割后的翻版。这说明了中共为了笼络民心，对“全红总”代表广大临时合同工所争取的权益也不敢否定，更显示了“全红总”抗争的正义性。而正义的“全红总”却在同一文件被勒令解散，真是中共自相矛盾的专横霸道。它无异于向广大临时合同工宣布：好处只能由我给你，“革命”的特权只能由我垄断。一切改善不能由你自己争取，只能由我赐予。

会议决定，搬迁到广州的全国总部鉴于中共公开取缔“全红总”，立即改名为“改革临时工合同工制度联络总站”。通知分团各自更改组织名字，进一步整顿基层，等待有利时机。北京分团改名后，可参加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保障组织不散。会议最后决定印发《三告全国人民书》，大家尽快离京，六七年“五一”劳动节在广州汇合。

会议结束后，外地赴京的“全红总”成员先后离去。我和毛胜年等待所有总部成员安全转移后，在二月二十二日取道上海南下，二十六日回到贵阳。“全红总”贵州分部此时已改名为“贵州省红色无产者大联合造反兵团”。李伯特、杨爽秋等北上去找我和毛胜年，和我们正好错过。

三月二日，我和毛胜年在贵阳看见了以牟立善为主任的北京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的“布告”，在这份布告上，将数十个群众组织打成“反动组织”。其中赫赫头一名的就是“全红总”。这份布告勒令被打成“反动组织”的基层成员要到当地公安机关报到登记，而勒令各层负责人必须去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公开宣称要逮捕镇压主要头头。看来，中共并没有以取缔“全红总”为满足。现在，中共已公然举起屠刀了。

为了保护贵州分部的广大群众，我和毛胜年到了已夺权的贵州省革委保卫领导小组，指出北京市军管会的这份“布告”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二月十七日的文件相抵触。因为在二月十七日的文件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并未将“全红总”打成“反动组织”，又宣布参加“全红总”的群众为“革命群众”（第六条）。我们告诉贵州省革委保卫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北京市军管会的这份“布告”不仅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二月十七日的文件相抵触，而且与中共的宪法相抵触。再说北京市军管会也擅越了自己权力。它有何权力对其它省份的组织妄加判定。贵州省革委保卫领导小组看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二月十七日文件后，觉得的确与北京市军管会的“布告”有出入。他们安慰我们，要我们向中央反映，他们也会向中央请示。我和毛胜年则做好了被捕的准备。

当时许多朋友劝我们快离开贵阳去避避风头。但我和毛胜年一一婉拒。因为我和毛胜年商量，我们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光明磊落，何罪之有？如果一走，正好授中共的“畏罪潜逃”的把柄，籍此迫害贵州分部的群众。我们还要等待正在为我们奔忙的李伯特一行回来，不能让他们成为我的替罪羊。

三月三日晚，李伯特一行回到贵阳。听说我和毛年已回来，他们顾不得回家，立即深夜赶到我家。李伯特告诉我，他们已在云南红河地区建立了安全基地，这次去北京就是准备去把王振海、毛胜年和我等接到红河。他早已买好次日凌晨到昆明的火车票，要我和他们马上去毛胜年家叫毛胜年准备立即动身。当我们正准备吃完宵夜出发时，一群全副武装的军人包围了我家。贵州省革委保卫领导小组来执行任务的负责人说，他们是奉中央之令来逮捕我们的。当晚，李伯特、毛胜年、杨爽秋和我等被捕。次日，“全红总”贵州分部的主要负责人潘汉发等数十人和总部成员张德明、余洪珠等均被关押。此时，全国各地的“全红总”各级负责人大都被捕，因此受到株连的群众则无法统计。

但临时合同工的斗争并未因“全红总”被镇压而消失。一批勇敢者仍在顽强地苦斗。直到六八年元月，中共又下达镇压临时合同工、反对“经济主义”的文件，并在六八年公开将“全红总”已被捕的负责人判刑，开展了新一波对临时合同工斗争的残酷镇压，才使波涛汹涌的临时合同工运动，也是文革中自由工运平息下去。

我本人在有所被判刑的“全红总”负责人中被判得最重——判有期徒刑最高刑二十年。王振海被判了五年徒刑。贵州籍的“全红总”成员毛胜年被判十五年，石应宽被判刑十五年，李伯特被判刑十年，欧阳林被判刑七年。其中除毛胜年在六九年提前“教育释放”，欧阳林坐满刑期七年外，其他几人均坐了十年以上的大牢，在“四人帮”被捕后先后平反。这些人平反后情况如何？

倔强的湖南人杨政（“全红总”保卫部长）平反后从未停止反抗。长沙的官僚们罗织罪名，使他几次陷狱。直到八九民运前夕，他仍然未重获自由。贵州人李伯特在西单民主墙时期就参加了贵州“中国人权同盟”的活动，八二年赴香港定居，在王炳章创建中国民联时期加入中国民联。李伯特以后在我的帮助下认识了贵阳浪潮读书会的一批精英。并通过这批精英中的一些人和贵州“启蒙社”的精英们筹组了中国民联的贵州分部。笔者七八年出狱后筹建了贵州的“中国人权同盟”。八九民运中，险些儿落入法西斯手中，现在被迫流亡海外。至于“全红总”的领袖王振海，在八九民运前夕，笔者听说他准备在长沙筹办一所民间大学，不知现在是否落成？

## 八、结语：红卫兵运动、造反派运动、自由工人运动

回首流逝的岁月，在无限感慨的同时有更多的反思。在长达十二年的监狱生活中，每当看见铁窗外的明月，翻滚的思绪就会平静下来，不断思考一个问题：“全红总”为什么会失败？三十年后的今天回答这个问题不算太难。但还有更多的问题值得研究。

我现在谈谈自己本文前言中提出的四个问题的见解：

一、“全红总”在文革中的抗争算不算工人运动和市民运动？它和当时的红卫兵运动和造反派运动有何区别和联系？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红卫兵运动和造反派运动，它们的特征是什么。关于什么是红卫兵运动，海内外史家和论者争议不多，这里从略。至于红卫兵的运动特征，不论是早期的红卫兵还是“红八月”以后产生的红卫兵，如仲

维光先生在《“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诞生史实》一文中所说，在思想上，以阶级斗争为纲，敌视一切不同思想，在行为上，狂热的领袖崇拜，血统论的阶级路线，群众性的暴力行为。

其实，许多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毁灭传统文化，伤害无辜人民，破坏社会秩序，抢劫公私财产的“打砸抢”暴行，都发生在那个“破四旧”的“红色恐怖”年代里。而红卫兵的这些暴行，又被中共官方和御用文人栽赃造反派头上。事实是，红卫兵施暴的时候，造反派多被压制迫害，哪有这种在光天化日下杀人越货而不被惩罚的特权！红卫兵实实在在是中共一党专政的疯狂卫道者，是中共法西斯政党的疯狂党卫军。所以，对这个灭绝人性的红卫兵运动，必须痛加谴责，彻底否定。

关于造反派运动，海内外的史家和论者争议很大。因为对于造反派的定义和评价，人们就有许多不同的见解。较有代表性的举例如下：

徐明旭先生有“狭义造反派”和“广义造反派”一说，徐先生言，“老造反派即狭义造反派”，“由保守派转化而来的新造反派即广义造反派”。徐先生说：“在我看来，按是否斗过共干的标准衡量，邓、胡把两者都叫作造反派是对的。”（徐明旭《也谈“文革”及“造反派”》，《中国之春》九三年一月）

刘国凯先生有这样的见解：“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民众中许多人带着自身的看法、感受、思索、要求、利益去响应毛及中央文革的‘战斗号召’投身运动。尽管他们在口头上，甚至在内心上是拥护毛，但其行动的客观效果往往是冲击了中共的社会结构，政治秩序，削弱乃至打击了中共的统治。藉此，我们可以继而进行判定：那些较明显具有‘文革造反’性的群众组织便属于造反派。”（《我的“文革”见闻与见解》，《中国之春》37期）

仲维光先生说：“……产生于文化大革命中期的造反派也没有独立的思想，他们同样也是极权社会、极权文化的产物。尽管他们在那个社会受到压制、不信任甚至迫害，可是他们总是不断地用各种方法表明自己的‘可靠’。……红卫兵的指导思想……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一切非无产阶级的因素，而造反派的指导思想……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二者当然有区别，区别在于红卫兵的矛头是权力阶层以外的人——被统治者，而造反派矛头所向的是权利阶层以内的一部分人。”（《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史实》）

徐先生所说的这个中共按是否斗过共干的标准的要害，是抹杀了在文革中斗过共干的人民群众和斗过共干的造反派的原则区别，是把在文革中人民群众反迫害、反官僚的自发的斗共干的正义行为，等同为造反派被毛利用成为权争工具清除政敌的奴从行为，而造反派的根本特征，如刘国凯先生言，是响应毛的号召，换言之，即是奉旨造反。徐先生先后引证并痛加谴责的如“联指”和“四二二”的武斗，“新华工”掌权后的施暴等等，大都发生在夺权阶段。而人民群众对造反派的鄙视和愤恨，大都产生于造反派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大搞武斗，殃及无辜，产生于造反派想做奴隶而终做成了的阶段。至于反资反路线时期造反派们斗共干，虽然斗得不甚文明，斗得反人权法制，但人民群众看见平常那些耀武扬威的官僚们威风扫地，心中也有几分快意，甚至参加进去斗他一番。在这里，我不欣赏任何以暴易暴，冤冤相报的行径。我只希望在一个现在仍在严重践踏人权，藐视法制的国度里，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应引导人区别砍下杀人犯的头和砍下无辜者的头的质上的不同。

所以，笔者希望诸位先进看到，文革中人民群众对成为毛工具的造反派——这些打手、帮凶的愤恨中，包含了对唆使利用他们的毛主席的更大的愤恨，包含了对毛所代表的中共暴政的更多的愤恨。因此，把造反派“响应毛号召”的这一根本特征抹掉，很容易抹去大陆人民对文革的集体记忆，或者歪曲这些集体记忆。由于造

反派“响应毛号召”的根本特征，不论是在批资反路线的阶段和夺权阶段，造反派的矛头主要指向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人。造反派斗某些共干的确给某些共干造成很大痛苦。但和这些共干给人民造成的痛苦比起来，哪一种痛苦要大一些呢，造反派在武斗和派争中的确也伤害过无辜的人，但和红卫兵灭绝人性的对无辜人民的伤害比起来，哪一种伤害给无辜人民造成更大的痛苦和损失呢？在文革中，红卫兵和造反派同样留下劣迹。我认为红卫兵留下的毁灭文化残害生灵劣迹大得多。但我也决不会因造反派的劣迹小于红卫兵的劣迹而放弃对造反派劣迹的谴责。再小劣迹也是劣迹。我对文革中的造反派运动给予基本否定的评价。这个“基本否定”的评价之所以不同于对红卫兵运动的“彻底否定”的评价，原因是造反派运动的早期，炮轰派的抗争确实冲击了文革前夕那种官僚化倾向十分严重，极端缺乏民主的沉闷的社会秩序，沉重地打击了中共的官僚体制。在人民头上的沉重的精神枷锁上砸开一个不算小的裂缝，并从这个裂缝中闪射“极左思潮”亦即“文革新思潮”的电光，划破了万马齐喑的寂静夜空。

和造反派运动相同的是自由工人运动也开始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如果说造反派们此时是奉旨造反，造当权派的反，那么自由工运人士则是趁机造反，趁批资反路线之机造中共剥削制度的反。此时的炮轰派、保皇派、自由工运人士大多是没有成型的组织。自由工运人士大多和炮轰派站在一起，和保皇派辩论对峙。那时中共各地各系统的横的纵的组织和机构大多瘫痪。平常穷凶极恶的基层公安派出所、办事处的官员和他们的爪牙——居委会的革命大妈们面对这一锅烧开的热粥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这是中共建政后控制力最低的时期，也是空气最自由的时期。正是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为自由工人运动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到了六六年十一月，各地群众组织纷纷出现。自由工运的组织——“全红总”也应运而生。在炮轰派和保皇派严重对峙的年代里，“全红总”被人们视为既不“保”又不“轰”的“四不象”组织。但很快人们就明白“全红总”提出“改革一切不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真实含义——“全红总”正企图解决他们的切身利益问题。这时不论是保皇派和炮轰派中的一些群众，纷纷退出保皇炮轰组织，加入这个不轰不保，但能给他们带来实际利益的工会团体。随着“全红总”组织的急速扩大，自由工运的声势越来越大，远远地盖过了“炮轰”和“保皇”的辩论声。到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全红总”基本主导了当时的运动，直到来年元月下旬“全红总”被镇压。到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面对已成气候的“全红总”，毛周都准备去利用烈性炸药了。

毛和周都是政治上极成熟、极敏锐的高手。他们从不敢轻视这股自发的力量。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就是在“全红总”封闭了劳动部的次日，江青接见“全红总”的十五名代表的当天发表的。毛为这个他未曾意料到的自发的工人运动、市民运动叫好，就像他当年为湖南农民运动叫好一样。他在叫好的同时，也想挥动他那指挥过千军万马，包括正在指挥他的疯狂冲锋队红卫兵的大手，把这股自发的力量纳入他的轨道。“全红总”不论以它影响全国的规模，不论以它主导过文化革命某一阶段（“反革命经济主义”阶段），不论以它独特的理论政治纲领，不论以它周密的行动日程安排，不论以它近千万的庞大群众，不论以它的长达一百天的持续时间（远远超过“二七大罢工”、“安源大罢工”、“五卅运动”。巴黎公社也不过仅仅坚持了七十天），它都堪称是一个自发的、真正的工人运动和市民运动。

在“反资反路线”时期，自由工人运动和造反派运动是政治上的同路人。只是在毛周联手把自由工人运动镇压下去后，在毛的扶持和利用下，造反派运动才真正登上历史政治舞台，主导了文革中的夺权阶段，继而争权武斗，直到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大都被关进牛棚和监牢。轻一点的则回家加入了做家具炼气功钓大鱼的逍遥派阵营。



自由工人运动和造反派运动的主要区别，第一在于自由工人运动有自己独立的指导思想，而造反派运动则没有自己独立的指导思想，他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思想。第二是自由工人运动是一场自发的，独立于毛的战略部署的运动，而造反派运动是毛亲手发动的，按毛的战略部署行动的运动。第三是自由工人运动从始至终都以争取政治民主、经济平等为诉求，坚决地反官僚特权，反剥削制度，而造反派运动一进入它主导的夺权——争权阶段，早期那点反迫害的民主色彩尽失，甚至堕落为压迫人民的新官僚。一句话，自由工人运动和造反派运动的根本区别在于自由工运人士是站着“造反”，而造反派们是跪着“造反”。

## 二、“全红总”的抗争是否有独立性？“全红总”属于什么性质的组织？

从前一个问题的探讨中，不难看出“全红总”是个代表文革中的自由工人运动的独立的工会组织。因为它和所有的独立工会组织一样，为它所代表的工人，尤其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临时工合同工争取政治上的权利，经济上的平等。它也和大多数独立的工会组织一样，对政权和各种权力没有多大兴趣。它希望统治者能满足工人的合理要求，它希望能监督统治集团的劳动立法，它希望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它代表广大工人为保障自己的正当权益而抗争。它是广大工人勇敢的代言人。它希望能有效地、理性地调节既得利益集团和它所代表的工人利益集团的关系。

“全红总”的抗争完全是自发的和独立的。笔者说“全红总”的抗争是独立的。第一，它有完全独立的指导思想。“全红总”的指导思想，是包裹在马克思主义外衣中的民主、平等思想。第二“全红总”不仅有自己独立的指导思想，而且有自己的理论纲领。《论临时合同工制度》就是这样一个理论纲领。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在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工矿企业根据生产规模的变化，产品的转型，季节性的原材料供应等因素，对劳动力将有不同程度的需求变化。有部分工人要经常流动，平衡各部门劳动力的需求，这是社会的合理需求。但是，反映这种合理需求的临时合同工制度却是不合理的。因为临时合同工制度没有保障这批处于流动中的工人的正当权益。他们没有工龄，没有福利，没有公费医疗，与正式工同工不同酬，受到歧视凌辱，随时有被解雇的危险。一旦解雇，就失去饭碗，妻儿老小的生存受到威胁。临时合同工制度严重地侵犯了工人的劳动权和生存权，而工人的生存权和劳动权在五四年制定的宪法九十一条到九十八条中明文规定必须保证的。

文章说，为了国家的发展，这批工人可以为了平衡社会劳动力的需求牺牲自己对稳定收入的追求。临时合同工与正式工同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他们只有岗位的流动与固定的差别，而没有人格和尊严的差别，也不应该有政治待遇和经济利益的不平等。工人阶级队伍不应也不能分裂成对立的两部分。不能在工人阶级中制造阶级。党内最大走资派想利用“两种劳动制度”分化瓦解工人阶级队伍，制造一小撮工人贵族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他们想利用工人阶级内部的冲突来转移工人阶级和走资派的冲突。今天的正式工，就是明天的临时合同工。工人阶级和新生的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现今社会的主要矛盾。走资派是新生的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他们要把社会主义国家，变成社会法西斯主义国家。如果一定要说临时合同工制是社会主义的劳动制度，那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到哪里去了呢？

文章指出，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但是，建国十七年来，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中的许多人仍为温饱而忧虑。而十七年来，已形成一个新生的垄断资产阶级。他们打着“全民所有制”的美丽招牌，占有和垄断了全民的生产资料。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已蜕变为走资派所有制。“公有制”的闪光外衣下是一张张贪得无厌的血盆大口。在走资派的压迫剥削下，十七年来，劳动人民不论做工务农，都处在“供不应求”的经

济危机中。如果说“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痼疾，而“供不应求”则是走资派专政社会的痼疾。走资派把“供不应求”解释成购买力上升的繁荣，实际上“供不应求”反映了人民的生活资料极其短缺，反映了社会的普遍贫困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目的是人民的普遍富裕，而不是普遍贫困。“供不应求”决不是经济繁荣的象征，而是走资派专政社会的挥之不去的经济危机的阴影。走资派专政使中国社会出现了五年左右循环一次的社会经济危机。文化大革命吹响了向走资派发动进攻的号角，中国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真正当家作主的时候来到了。

这篇文章因为时间久远，无法记忆原文。以上仅是大意。从文章大意中可以看到，虽然受到文革的历史环境限制，在批判走资派的话语中仍然包含了工人阶级要真正当家作主的思想内涵。

第三、“全红总”不仅有自己独立的指导思想和理论纲领，也有自己独立的行动日程。不论是到全国总工会两次静坐、封闭劳动部、签署《三家联合通告》、召开《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举行天安门广场的示威集会和游行，全都是“全红总”自己完全独立的决定，与中共高层无关。与中共高层有关的行动只有两次，一是进驻全总。但当时江青如果不叫“全红总”进驻，“全红总”自己早有封闭全总的日程安排。另一次是召开北京工人体育馆万人大会。这两次与中共高层有关的行动占“全红总”行动全过程中很小比例，影响不了“全红总”行动的独立性。再说，中共最高当局下令“全红总”销毁“联合通报”，“全红总”阳奉阴违，在暗中大量印发。中共最高当局下令“全红总”自动撤销组织，“全红总”置若罔闻，我行我素。直到中共当局把“全红总”打成“反动组织”，“全红总”仍然没有停止自己的抵抗。历史就是历史。“全红总”独立自主为工人争权益，将永远留在历史上。

三、“全红总”是不是中共上层斗争的产物？它和当时中共上层斗争有无互动关系？

早在中共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年代，青年期的李伯特和我就已经注意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两个口号的出现和对立了。当时我们认为，经过六二年以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经过两三年放宽政策的养息生存，遭受过“大跃进”严重伤害的中国大工业发育不良的畸形躯体，已经迟缓地成长起来了。“工业学大庆”就是中国大工业形成的讯号和标志。“农业学大寨”只不过是毛为代表的大农奴主阶级对抗以刘邓周为代表的垄断资产阶级的反映。随着中国大工业逐渐形成，大工业的一体两面——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逐渐成熟。占有生产资料的中共反而不能代表中国工人阶级，也不再为中国工人阶级争权益了。中共的社会地位迫使它不得不去代表工人阶级的对立面——资产阶级，并为这个自称是无产阶级的垄断资产阶级谋利益。因此，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员，特别是觉悟了的一员，必须为自己争利益。

正是基于这一理念，青年时期的李伯特和我一直在作迎接革命危机的准备。文革开始前，《论临时合同工制度》已经写好。就算毛不发动文革，中共党内的垄断资产阶级和大农奴主阶级的决裂和决斗是迟早要爆发的。所以，中共上层斗争只能为“全红总”的出现提供机会，而“全红总”不是也不可能是中共上层斗争的产物。

“全红总”虽然不是中共上层斗争的产物，但和中共上层斗争的互动关系是存在的——这就是中共上层与“全红总”之间互相利用和反利用的关系。毛刘之争在“全红总”看来是一个缺口，临时合同工制度也只不过是一个突破口。“全红总”的领导核心早就计划在解决了临时合同工问题后，将提出一系列的劳动、工资、福利、社会保险、工人的参政权、工人在企业中的管理权等等问题。而毛集团在“全

红总”显示力量封闭劳动部后，通过江青接见，就公开向“全红总”伸出了操控之手。毛首先想到利用“全红总”去夺全国总工会的权。在六六年十二月底至六七年初那个阶段，毛认为夺权时机已经成熟。毛一贯的手法是树立一个典型，取得点上的经验，然后推广到面上去。当时，毛非常需要树一个夺权的典型。碰巧“全红总”这时封闭了劳动部，并决定次日要封闭全国总工会。全国总工会一向很不讨毛喜欢，因为毛一直认为那是搞工运起家的刘少奇的黑窝。毛是靠搞农运发迹的。他一直对他的同盟者非常不放心。此时如果夺掉这个花瓶机构的大权，又安全又解恨，何乐而不为？“全红总”封闭劳动部的动作和夺权的动作已很接近。所以，神经过敏的毛对“全红总”有了一个极大的误解——他误以为“全红总”已悟了他夺权战略的禅机，如聂元梓悟了他反当权派，蒯大富悟了他反工作组的禅机一样。于是才有江青的“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但是，进驻全国总工会后的“全红总”并没有按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去夺全国总工会的大权。毛以为“全红总”还有顾虑，所以派出解放军——《解放军报》的编辑邵一海“支左”（当时还没有“支左”一词出现，但毛应早有派军队“支左”的打算。），并找来了全总国际部副部长、老革命陈乃康。广播局的亲信李晋喧也“掺沙子”掺进了“全红总”。以后在文革夺权时期出现过的一系列花招，此时都在“全红总”提前出现了。老人家想把“全红总”经营成他的试验田。李晋喧等人早就向王振海和我透露过伟大领袖的战略企图——夺权。“全红总”五人领导小组也认真讨论过是否去夺全国总工会的大权。但王振海和我明确表示“全红总”的当务之急是解救那些陷于苦境的临时合同工。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被解雇后流离失所，悬梁跳河。我们对夺权当官的确没有兴趣。当时，《工人日报》造反派头头跑来找王振海和我，希望“全红总”配合他们再加上《解放军报》的邵一海，一举夺下全国总工会的大权。这已经是不久就将出现的“三结合”夺权模式了。但是，王振海和我婉言拒绝了他们的苦苦请求，告诉他们要夺权他自己去夺。结果，这伙人还是去夺了《工人日报》的权并将之改名为《工人造反报》。如果当时“全红总”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去夺了全国总工会的大权，可能文革中又多了一个聂元梓、蒯大富那样的造反英雄了。“全红总”可能被树成夺权典型了。但是，历史决不会因此改变。了不起王振海变成王洪文。

“全红总”没有成为毛的夺权工具，可能毛认为这伙人太愚钝，有勇无谋。虽然不满意，但仍然想利用“全红总”去做点什么——因为“全红总”的确有些力量。不讲全国除西藏而外都有分团，光是北京就有团员五十多万人。还不算（据周恩来说）上百万的外地来京工人。这百万外地来京工人中大部分是临时合同工——被解雇了无工可做无饭可吃，走投无路只有上京告御状的饥饿工人。毛当年在湖南玩过农民运动。他深知一大群饥民聚在一起可能发生什么——历史上的陈胜吴广李自成，当代的彭湃毛泽东，哪一个不是饥饿人民的“天才的创造性的”煽动者和组织者？因此，毛想利用“全红总”这桶烈性炸药去炸掉他真正最棘手的敌人——周恩来。

“全红总”既不愿去做夺权典型，又不愿充当炮打周恩来的工具，更可恶的是“里通外国”——去开什么“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不可饶恕的是偷偷印发三家联合通告》，刮起了“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是可忍，孰不可忍。”只是为了顾及老婆和自己的面子，就叫“全红总”自动解散吧。如果这次“全红总”在高压下听话，也可省去不少麻烦。这笔账留到秋后再算吧。可是，“全红总”吃了豹子胆了，偏偏不听首长的话，胆敢和伟大导师对着干。毛又和周再次结盟，镇压了“自由工人运动”。周本来想把毛利用的这股祸水，反利用引它冲到毛的头上——这是周准备参加“全红总”召开的大会的本意。但是周去开会途中遇刺，不说对“全红总”恨之如骨，也是非常不喜欢了。特别是全国性组织本身就有夺中央当权派之嫌。中央当权派乃打不倒的国务院总理是也。但因毛一直纵容“全红总”而不好下手。现在毛同意产掉“全红总”，周趁机把一切全国性组织包括各地造反派组织来个一锅端。于是就有了“二月镇反”。“二月镇反”后毛大为后悔，因为他好不容易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熊熊烈火”第三次被扑灭下去（第一次被“六七月份的

资反路线”所扑灭，第二次被“红八月”红卫兵所扑灭）。他又来了一次大平反，“二月镇反”变成了“二月逆流”。

不过，这次大平反中却没有“全红总”的份——历史说明了“全红总”和中共高层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利用与反利用，控制与反控制，镇压和被镇压的关系。

四、“全红总”的抗争对文革历史和当代中国大陆自由工运有何影响？当前的大陆自由工运人士应从“全红总”的抗争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

“全红总”的抗争对文革历史的影响在于它曾独立地主导了六六年十二月至六七年元月那一时期的文革造反运动。也就是中共官方史官所谓的“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那个寒冬。这是文革中第一次群众自发的自由工人运动。中国工人在改革开放中生活品质有了改善，但受惠不多。市场经济的建立不能依靠损害中国工人的利益。如果中共当权者真正愿意为中国大陆工人的利益考虑的话，应该知道自由工人运动人士决不是它不共戴天的敌人。自由工运人士是社会中的建设性因素。它的出现只会增加社会的稳定力量。如果当权者能理性地顺应自然和顺应历史，自由工运人士不构成对中共精英的威胁。因为自由工运人士在争取中国工人的权益的时候，懂得尊重其它社会集团的利益，包括中共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但中共既得利益集团也应该懂得，整个社会的利益不能由它所独占。它只有懂得充分尊重每一个社会集团的利益的时候，它的既得利益才能得到充分保障。

文革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三十年前，都会出现“全红总”这样的独立工会组织，何况在今天市场体制已经形成的大陆中国？过去的已经过去。生活在一个充满仇恨的社会并不愉快。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希望忘掉仇恨，但不能忘记历史。今天的自由工运人士应该更加清楚地记得“全红总”三十年前曾指出：中国工人为了中国的工业现代化，能牺牲自己对于一个稳定职业的追求，但不能牺牲自己对稳定收入的追求。为中国工人争取他们的社会保险和争取他们在企业管理上的发言权，这是当年“全红总”未完成的历史任务，现在已义不容辞地落在今天年轻的自由工运人士肩上。“全红总”当年同样是年轻一代，为了中国工人的切身利益，为了中国工人能真正当家作主，前仆后继，奋不顾身，许多人在监牢里耗尽青春。要做顶天立地的主人，不做跪地求饶的奴才，这应该是“全红总”留给后代自由工人运动的一份遗产。（续完）（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八日 坎培拉）

□ 原载《北京之春》第47期（本刊有删节）

---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

|           |         |                       |
|-----------|---------|-----------------------|
| 本期责任编辑：   | 华新民（美国） | <cnd-cm@cnd.org>      |
| 本期 校对：    | 尚琳（英国）  | <cnd-cm@cnd.org>      |
| 读者技术咨询：   | 张雨田（美国） | <cnd-help@cnd.org>    |
| 网络技术维护：   | 关蔚禾（美国） | <cnd-info@cnd.org>    |
| 《华夏文摘》主编： | 李彤彬（美国） | <cnd-cord@cnd.org>    |
| 《CND》总编：  | 熊波（美国）  | <cnd-manager@cnd.org> |

---

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请寄：LISTSERV@UGA.UGA.EDU（GB版）  
并请注明：SUB（或SIGNOFF）CCMAN-L FIRST LASTname  
或寄：LISTSERV@BROWNV.M.BROWN.EDU（HZ版）

并注明: SUB (或 SIGNOFF) CNDBRU-L FIRST LASTname

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

---

其他获取或阅读《华夏文摘》的途径:

无记名文件存取 (F T P) : ftp.cnd.org[149.159.2.6]: pub/hxwz

或 canada.cnd.org[142.132.12.100]: pub/cnd/

hxwz

万维网服务站 (W W W) : http: //www.cnd.org/HXWZ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WL, XT and GC